

## 一、研究報告

從綠島政治犯的自傳及回憶錄上看到的「克難」，是開啟這項研究計畫的起點。尤其是對於第一批到綠島的政治犯，他們作為囚犯的任務除了接受思想改造之外，就是建造關自己的監獄，因此經常會描述與克難相關的管方政策及監獄日常。陳英泰描述，當時新生訓導處剛設立，物質跟經費都極端不足，管方什麼事都要他們「克服困難，簡稱克難，諸事都要以這個或那個來替代或自行製造自行解決，也就是要無中生有的意思」<sup>1</sup>。而且為了提倡及鼓勵，經常把東西用克難來命名，例如克難品、克難房等等。陳英泰描述，大部分「新生」們對於這種政策不以為然，只是冷淡應付。原本以為之所以提倡克難，是因為綠島的現實，但後來才發現，這個政策背後有著更大的現實。

### 1. 重新定義克難

1950 年，蔣經國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之後，發起「克難運動」，從軍中開始逐漸延伸自機關學校，強調「戒奢戒惰，克勤克儉，發揮克難精神」<sup>2</sup>，透過雙手萬能來發明、生產、建設、修理、節約等任務，除了這些不同的克難成果會量化呈報之外<sup>3</sup>，也會舉辦國軍克難英雄選拔、克難競賽、克難成果展、克難球隊來推廣，甚至在 1951 那年，有不少軍警單位以克難成果作為向蔣中正祝壽的禮物。當時政府以「反共抗俄」作為推行這項計畫的理由，但實際上，必須從上至下開始克難的理由更加複雜，在台灣島內的背景中，儘管二戰已經結束，但國共內戰還繼續打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可以說仍然處在戰時體制中，糧食政策的首要任務是軍工糧而不是民生，過往從歷史課本中學習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都是惡性通貨膨脹，但通膨的理由都會以戰後國際經濟局勢帶過，但依照經濟學者謝聰敏的分析，戰後到 1950 年的米荒及通膨，是源於當局問題重重的價格管制政策；而在國際的背景中，1949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決定放棄扶不起来的腐敗國民黨，宣布不再援助蔣介石政權也不插手國共內戰，但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之後，台灣被放到美國在冷戰版圖的部署中，隔年恢復美援。

---

<sup>1</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台北：唐山，2005，頁 328。

<sup>2</sup> 出自〈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淺釋（重訂）〉。

<sup>3</sup> 「現在讓我們鄭重而興奮地宣佈本年克難的總成果：（一）發明類（新武器通訊設備等）計三九三種，（二）生產類（養豬雞鴨及製造用具等），計四、五四四、七七九件，價值一七、二七二、三八九元，（三）建設類（建築營房及修造道路橋樑等），計八、一三四、八五五件，價值一六、二六九、七一〇元。（四）修理類（修理槍械及修補被服等），計二、一九四、九四三件，價值一、〇九七、四七一元。（五）節約類計一〇、八八四、三〇一仲，價值一〇、八八四、三〇一元。總計一四、八七四、九七〇件，價值四五、五二三、八一七元。」〈一年來克難成果 高度發揮了官兵智力 完成充實戰力總任務〉，1951-12-30/聯合報/02 版/



1951 年 1 月 1 日蔣中正總統元旦宴克難英雄（中央社）。

戰爭動員下，要求人民節省資源、配合國家的徵收及配給制度、善用在地材料等政策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會做的事，例如二戰當時美國政府的宣傳口號「Use it up, wear it out, make it do, or do without」、英國政府發起 Make Do and Mend 運動、日本政府在國民精神總動員時的關鍵口號之一「奢侈是大敵」（ぜいたくは敵だ）等等，但國民黨在韓戰期間推行克難實踐運動時，與戰時體制或動員相關的描述很少出現在相關的官方文件或宣傳資料中，克難被結合起儒家思想（如勤儉）成為一種美德。為了將克難一詞還原為中性的行為，我整合起 makeshift、make-do、ad hoc、bricolage 等英文相近詞彙的定義，將克難定義為因應當下需求而將現有資源極大化的因應手段。透過這個定義，我企圖讓克難成為理解戰爭發生時，普通人所採取的行動，一種為了生理上或精神上的續命而不得不做的事，與情操、美德無關。在這個調查中，我會用克難來理解看似被放在極端的對象：政府及人民的克難、物質上及概念上的克難、歷史現場及記憶的克難，這些克難實踐有時道德有時則否，有時務實有時則否。

克難之所以能提供一個理解戰時生活的角度，最關鍵的一點來自於，它能避開以政權、事件來劃分時代的假象，讓我們窺見宣稱著大變動的時代下不變的連續性。為了更準確的描述此「連續性」，我參考 Ann Laura Stoler、Madina Tlostanova、Rolando Vázquez、Walter Mignolo 等學者對於殖民性／現代性（coloniality/modernity）及解殖性（decoloniality）的分析。「殖民性」不同於「殖民主義」（Colonialism），後者指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形構，前者指的則是「一套約在十六世紀形成的多重支配結構，涵蓋種族、經濟、社會、存

在、性別與知識層次，將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牢牢結合，並自此在現代／殖民世界中持續運作，只是不斷改變其形態」<sup>4</sup>。殖民性作為現代性不可分割的陰暗面，成為定義了勞動關係、文化、知識生產等各種面向的權力關係，並一直影響至今。換言之，殖民性觸及的已經不是政治論述的解殖（decolonization）足以面對的領域，我們必須思考解殖性：這是由 1990 年代開始被發展的概念，它處理的是殖民主義的持續性脅迫（duress），一種緩慢改變我們思考框架的過程。在這樣的討論下，克難物除了是為了生存的權宜之計，也是儲存各種宣稱改變實則不變的連續性的證物，迫使我們發掘那些被新舊秩序交接所掩蓋的日常生活，並揭露出何以歷史總是當代史

## 2. 克難物的類型

以下我以本次克難研究的踏查及訪談中所收集到的各種克難標的，分成四個類別來說明，但每個標的之間經常會跨越分類，甚至同時出現在不同類別中：

### (1) 克難人／物

克難物是最容易被直接觀察到的克難標的，在戰爭或國家緊急情況發生時，因為資源必須重新由當局主導所有的分配及調度，無論是食物、民生用品、軍需品或媒體，都經常可以看到必須運用手邊有的東西，來湊合著使用的情況，有些克難來自統治者的戰時政策，有些則是人民在不得不的情況下發揮的創造力。菲律賓在日本佔領時期發生食物及民生用品短缺的情況<sup>5</sup>，為了緩解開始實施食物替代政策，鼓勵民眾用菲律賓本地生產的東西來取代進口的物資，例如用椰奶及豆奶取代牛奶、芒果取代桃子罐頭及果醬、地瓜取代麵包、烘烤穀物並磨成粉來取代咖啡、當地植物 Gogo 取代洗髮精等等。由統治者發起的食物克難政策經常是暫時的，但由民眾創造出來的克難食物有時候會影響到當地的飲食文化至今，以在韓戰當時作為臨時首都的釜山為例，觀光客們趨之若鶩的小麥冷麵（밀면）及豬肉湯飯（돼지국밥），都是戰時補給品、難民及原本住民的飲食文化交流之後所出現的產物。

民生用品的面向上，之所以當局下令民眾使用替代品，除了資源短缺之外，也是為了將有限原料提供給軍需品的生產。二戰開打之後，日本因為銅資源短缺，在朝鮮推行由自願捐獻逐漸變成強制徵收的金屬徵用運動，熔毀徵收來的黃銅器具（如碗盤、祭祀器皿、洗衣盆等）來製造子彈、步槍、砲彈與水雷，當局則會發給陶瓷製品作為替代品。這項建立在《國家總動員法》（1938

---

<sup>4</sup> Tlostanova, M. (2012). Postsocialist ≠ postcolonial? On post-Soviet imaginary and global coloniality.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48 (2), 130 – 142.  
<https://doi.org/10.1080/17449855.2012.658244>

<sup>5</sup> 菲律賓從戰前就不太是能夠自給自足的生產狀態，包括米在內，都要靠著從區域內其他國家進口，這是因為在美國殖民下，主要會種植的是往殖民母國出口的經濟作物。

年)·《金屬回收法》(1941 年) 及《金屬非常回收要綱》(1943 年) 等法規基礎上的政策，主要是由家庭主婦組成的「愛國班」以及當地由古物商形成的回收產業配合進行，這些古物商雖然一方面像是殖民政府的官方代理人，另一方面他們卻又以黑市交易、非法倒賣等方式擾亂殖民政策。這項政策最終導致黃銅器具在韓國家庭中幾乎絕跡，由陶瓷和後來的不鏽鋼所取代，徹底改變了韓國的日常生活物質文化。



金屬徵用運動中發放的陶瓷製替代品印有「供出報國」字樣，照片攝於首爾歷史博物館。

克難物中媒體的類別可以從設備及使用方式兩種面向來探討。新政權經常會接收上一個政權的媒體設備，甚至是沿用相關人才及規範。例如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日本殖民地時期的製片機關（台灣電影協會和台灣報導寫真協會），改組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電影攝製場（簡稱台灣省電影製片場或台製）；而在日本佔領菲律賓初期，原本屬於私人電台的 KZRH 被克難為兩組由敵對陣營操作的廣播系統：美軍在柯雷希多島上的「自由之聲」及日本在菲律賓架設的電台 PIAM（Philippine Islands A Manila）。此外，日本也沿用美國殖民時期廣播從業人員及表演者。對於不得不在殖民政府控制下的媒體工作並協助政治宣傳任務的被殖民者們而言，有的人是因為怕生命受到威脅而不得不配合，有的人則善用媒體來偷渡訊息，例如為了聯繫起抗爭運動，例如擔任日本控制的電台下的播音員 Yay Panlilio 藉由暗號和柯雷希多島上的人通訊；或是為了批判殖民政府，例如漫畫家 Liborio Gatbonton 在日本控制的報紙 Tribune 上以非常曖昧的方式連載批判戰時政策的漫畫。

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在運作過程中，逐步在宗主國及殖民地之間建立的對

他者的辨識系統，在戰爭開始之後會進一步被強化，以至於那些不屬於「我們」的「他們」在動員時，會被視為應急用的克難物被使用。事實上，統治者是藉由在一連串對於不同條件下的非我族類身上實驗他們的用處，逐漸累積起治理的策略。從 19 世紀後期開始，日本與俄羅斯的矛盾逐漸加劇，使得日本政府急需開發北海道，除了穩固勢力之外，也為了開發自然資源。此時從 1870 年代開始，因為各種內戰而劇增的囚犯就成為開拓蝦夷地的廉價勞動力。當日本開始擴張地圖版圖，1940 年前後起，約三千名朝鮮人也被強制動員到北海道，除了朱鞠內湖附近的水壩及紙廠建設，發電站、礦坑也是被動員的主要目的地，許多人在極其惡劣的勞動環境下死在冰天雪地的異國。事實上，日本其他地方也有朝鮮人強制勞動的歷史，包含長野的松代皇本部、長崎的端島等。如果殖民地男性被當成物品被克難使用的方式是勞動力，發生在女性身上最惡名昭彰的強制勞動，就是從各個殖民地及戰俘營，誘騙、脅迫或擄掠女性為日本軍提供「慰安」工作。當時在慰安婦、慰安所的制度訂定上，從運送、闢建、執照、檢診等都有詳細規定，但在這些檔案中，慰安婦經常是被列為「軍需品」。這段剝削史並沒有因為終戰而結束，而是演變為李範宣在小說〈誤發彈〉中所描述的洋公主（양공주），又或是洋基妓女（양갈보, Yankee whore）及 U.N. madams。1950 年代，韓國有許多女性為駐韓美軍、聯合國軍和韓國國軍提供性服務，除了韓國人之外，也包含從東南亞各國販運到此的女性。而在曾經擁有美國在海外最大軍事基地的菲律賓，特別是在蘇比克灣海軍基地（Subic Bay）與克拉克空軍基地（Clark Air Base），也有許多農村女性被賣到這裡，也發生許多虐待及死亡的事件。而在越戰期間，台灣參與其中的「休息復原計畫」（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 R&R Program）也是透過吧女，使台灣成為美軍性觀光的一站。換言之，慰安婦之所以殘酷，正是在於它並不是歷史，而是如有些學者以「軍事－性產業複合體」（Military-Prostitution Complex）描述的現況。

合作者是我在研究過程中，越來越感興趣的關鍵字。在合作者身上出現兩面性：他們是積極克難的、務實的使用手邊資源的人，但在統治者眼中，他們也是最好用的克難物。合作者是個非常具爭議的命題，即使在選擇「合作」的當下，每個合作行為的動機、程度、預期結果等都有差異，但在戰爭結束、政權移交之後，所有的合作動機卻都以「叛國」被定罪，即使學界內對合作者的討論從 1980 及 1990 年代前後開始出現改變<sup>6</sup>，將研究視角從菁英及高層轉換到大眾，不將合作者只視為背叛者，而是處於灰色地帶，並強調對合作者的戰後清算總是選擇性的，經常取決於戰後政權的政治需求而不一定是法律，但在從

---

<sup>6</sup> 相關的書籍例如 Philippe Burrin 的 *France Under the Germans: Collaboration and Compromise*、Fabrice Virgili 的 *Shorn Women: 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imothy Brook 的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尹海東（윤해동）的《殖民地的灰色地帶》（식민지의 회색지대）、Teodoro Agoncillo 的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Laurel-Vargas Collaboration Case* 等。

博物館被再現的官方敘事中，這些複雜性經常被抹除。

當我們把關於合作者的討論從「有名字的合作者」轉向「沒有名字的合作者」，或許才能不以後見之明的道德判准來批評當時人們的選擇。以戰時動員下朝鮮婦女的情況為例，當戰火擴大，動員的不只是上前線的軍人，後方的婦女及兒童也都被納入皇民奉公體制中。家庭主婦們組成「愛國班」協助殖民政府登記人口，以在物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換取額外配給或報酬，但他們不會知道「讓統治者找得到人」在戰爭的情況下意味著什麼，如同 Michael Kim 教授在訪談中所說的，在強制及合意之間，其實是一條非常細的界線。此外，當朝鮮男性勞動力因為戰死以及被派去滿洲及日本從事勞動而大量不足，女性的統後奉公時包含兩種「生產」：組織增產隊、挺身隊前往工廠、戰地的勞動生產；以及多生小孩來確保戰時所需人力資源的生產。崔末順教授以「母性的動員」描述這種情況，但他也強調，即使到了戰後，韓國及台灣的女性再度在「國民」論述中要求在身心上為反共、愛國奉獻<sup>7</sup>。如果非黑即白的批評合作者，那不是在日本殖民時期生小孩的都是合作者，在戰後政權下生小孩的都是愛國者嗎？而各種領域的藝文工作者也經常被納入政治宣傳體制中，在日本的殖民地或佔領地，經常可以看到以「奉公會」或「報國會」為名的龐大藝文組織，領域包含文學、美術、演劇、音樂、電影等，要求殖民地的創作者配合當局的政策、意識形態創作，這些人們也經常被視為合作者，在下一個政權來臨後遭到清算或排擠。但和女性一樣，藝文工作者對於所有政權來說，也都是好用的克難物，在冷戰宣傳網中，反共及建立人民對新秩序的認同成為新的「報國」任務。但合作和抵抗可能同時發生，據實呈現政策推行的社會現狀及批評政府也經常在同件作品中呈現，因為統治者就算能審查訊息，但他們無法讀到一些只有在殖民地人民之間才能讀懂的默契，也無法控制讀者端藉誤讀或過度詮釋所克難出來的能動性。

## (2) 克難空間

我將克難空間分成兩種類型：可見並且有建築物的實體空間以及不可見並且不被允許的公共空間。就和媒體作為克難物的情況一樣，新到的政權會接手上一任政權的資源，沒有太強烈紀念或宗教功能的建築物會被留用，當我們挖掘一個空間的過往，經常會發現這個地方裝載許多意識形態相左的政權歷史。此次去新加坡踏查的地點中，樟宜監獄、武吉知馬山丘回顧館、前福特工廠都是英國殖民時期建成，日本佔領時期沿用。釜山也有許多這樣的地點，目前被列為教科文組織（UNESCO）暫定名錄的「避難首都釜山」所包含的九個地點中，有些在沿用之後維持一樣的功能，有的則另作他用，但在克難的挪用的過程間，也呈現出戰時殘酷的社會現況。與政府及相關人員相關的地點包含臨時

---

<sup>7</sup> 崔末順，〈成為「國民」：國家總動員體制下臺韓的女性動員論述〉，《대만연구（臺灣研究）》，22（2023.6），頁 101-127。

總統官邸（1925 年建成，為慶尚南道知事官邸，現改為臨時首都紀念館）、臨時政府大樓（1925 年建成，日治時期為容納國務會議及核心政府部門的慶尚南道廳大樓，現由東亞大學管理，並作為其博物館使用）、韓國氣象廳（1933 年建成，戰後繼續使用至今，現在也有展示廳）、釜山港一號碼頭（1912 年建成，朝鮮貨物由此運往日本，韓戰時期也是難民、救援物資運抵地點）、美國大使館／美國新聞處（1929 年建成，為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在釜山的據點，現為釜山近代歷史館）、海厄利亞營（1930 年代為娛樂功能的賽馬場，1941 年開始被用於日軍訓練場及外國戰俘臨時居留中心，戰後成為美軍營地，現為釜山市民公園）。

與難民相關的地點有兩處，峨眉洞墓碑村以及牛岩洞。峨眉洞這一代在 1906 年為日本人公墓，位於離港口較遠、地勢稍高的地區，終戰之後，很多日本人在返國之前取出親人骨灰，但留下墓碑，韓戰期間，那些無法納入有限的政府收容系統的人們，就現地取材以墓碑來蓋住所，目前這一代仍是住宅區，同時以戶外博物館的方式規劃為歷史景點。這次訪問的車哲旭教授即是推動峨眉洞相關研究重要的學者之一。牛岩洞在 1909 年是牛隻檢疫站，兩年後又蓋了是牛瘟的疫苗生產工廠，據說當時因為血清實驗死了大量牛隻。從 19 世紀晚期開始，日本對韓牛的需求增加，開始從釜山港出口，因此牛岩洞是最理想的地點，也是這類型的設施中最大的一處。韓戰爆發之後，政府徵用了劇場、工廠等大型設施以設置 40 多個難民收容所，牛岩洞成為其中一處，這個原本為牛設計的建築隔間塞入大量難民，衛生條件極差。即使如此，空間仍然不夠大量難民使用，因此也有很多人以木板、竹子等手邊有的材料拼湊出棚屋。總體來看，除了聯合國紀念墓園是在 1951 年建成之外，所有地點都是克難使用的空間。



目前去牛岩洞仍然可以從建築結構看出原本牛棚的隔間。

在極權管理下，所有宣稱是公共空間的空間——無論是實體的公共場所、機構或媒體平台——並不真的具有公共性。因此在克難公共空間的類型中，我想討論的包含那些和審查、禁令、政治宣傳及動員等法規斡旋，克難的用合法及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製造出公共空間的案例。黑市是在戰亂之下重要的克難空間，釜山的「國際市場」即是非法交易大本營，難民們除了在此販賣食物（例如把麵粉加工成包子賺微薄的價差），裡面也販售許多走私或是從美軍軍營偷出來的物資；金屬徵用運動中，作為政府代理人的古物商又會以非法倒賣的方式創造另一種市場。在展演空間上，「茶房」（다방，類似現在的咖啡館）是重要的案例，韓戰當時，釜山成為各領域難民藝術家聚集的城市，茶房不僅成為聚會點，也成為展演發表的複合空間。而在展演空間及資源有限以及統治者控制的情況下，報紙、雜誌等紙本媒體也經常成為替代空間。另一個有趣的克難案例則是殖民地朝鮮公共廁所內的反日塗鴉，在沒有社群媒體、公共空間又經常受監控的年代，廁所成為最理想的替代性公共平台，人們會匿名在廁所塗鴉，使得當局必須設清潔小組來清除這些不斷出現的反日訊息。因此，透過塗鴉及謠言，我們得以理解人們如何回應統治，當積極抵抗的成本過度高昂，人們經常選擇在公共場合配合體制，但在私人空間裡，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

### (3) 克難時間：

克難時間討論的是關於解殖性（decoloniality）的兩種時間性：當下的時間及事後的時間。在極權統治下，公開反抗經常會遭受直接鎮壓，也因此儘管我們仍然能講出不同國家的革命或抗爭事件，但如許多訪談學者強調的，公開反抗其實是非常罕見的情況。相對於此，有些學者嘗試理論化那些發生在統治者背後的抵抗，例如 James C. Scott 的「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及「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Michel de Certeau 對「策略」（Strategy）及「戰術」

（Tactics）的區別、Asef Bayat 的「安靜的侵占」（Quiet Encroachment）等，都強調無名個體在日常中的能動性。但我在想，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種語言，來描述處在集體公開反抗及個體私下抵抗之間的實踐？這種實踐仍然是朝向集體的作為，但藉由製造出事件發生但統治者沒有注意到或尚未反應過來的短暫時差，來克難出不可能的公共空間。尹海東（윤해동）的「殖民公共性」

（colonial publicness）提供一個我在思考這類型實踐的參考，殖民公共性指的並不是實體的物理空間，也沒有固定的形式，而是以一種既靈活又轉瞬即逝（flexible and ephemeral）的隱喻（Metaphor），存在於抵抗與合作交織的灰色地帶，在其中，「社會領域」（the social）得以轉化為「政治領域」（the political）。尹海東特別提到殖民地人民在接收現代媒體時所表現出來的「受眾公共性」

（Audience publicness），他提到，朝鮮人民在觀賞早期電影時，總會有跳神（굿）或其他傳統娛樂表演以及現場的辯士作為中介，除了殖民地人民以在地化的方式解讀或誤讀電影之外，他們也善用劇院及電影院作為殖民統治下為一

可合法集會的場所，來施展能動性。這種情況在台灣亦然，三澤真美惠教授以「臨場式本土化」來分析台灣文化協會成員們從 1926 年至 1933 年期間的電影放映活動，辯士們透過用台語來刻意曲解進口的無聲電影，來現地生產「我們的電影」，在那些啟蒙或民族主義式的過度詮釋來沒被臨監警察意會並喊終止之前，那個放映時刻也就是被克難出來的殖民公共性時刻。即使出了劇院，轉瞬即逝的抵抗看似停止，但這個「『我們』一起看表演」的經驗會以流言的方式延續。三澤教授將 1960 年台灣人對「日本電影欣賞會」的狂熱解釋為日治時期臨場式本土化的一種繼承，當新到的政權在社會上建立起新的語言位階，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刻反轉了會日語的本省人與不會日語的外省人之間的階序。

如果當下的克難時間旨在打開我們對公共性的理解，並從所有轉瞬即逝的抵抗中找到各種藉由表演及語言來製造時間差的形式；事後的克難時間則指向關於找尋、確立、校正「後記憶」(postmemory)的實踐。後記憶源於 Marianne Hirsch 在 1990 年代初一篇討論 Art Spiegelman 著名圖像小說 *Maus* 的文章，這個詞探討的是後來的世代如何「記得」那些個人、集體、文化上的創傷，在其中，與過往的連結並不是藉由回想，而是透過想像、投射、創造。重訪殖民史之所以困難，除了時間本身的因素之外，人為因素也扮演很關鍵的角色。政權替換之際，檔案經常被銷毀，此外，二戰尾聲的空襲也燒毀許多物證，馬尼拉戰役期間，許多西班牙及美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檔案、建物都被焚毀。其他人為因素包含戰後新政權為了掩蓋自身及盟友屠殺本國民眾的歷史所下的有形及無形禁令。這次去的踏訪的前殖民地中，台灣、韓國及菲律賓的民主轉型都是在 1980 年代下半發生，而當能夠重新回頭審視國家暴力，也都已經是距離事發當時好幾十年之後的事。

在這次的訪談中，我收集到了許多後來的世代試圖克難地「做時間」的方法。首先是口述，儘管學者的研究對象差異很大，例如難民、強制勞動者、不同面向的合作者等，但數位學者都不約而同提到口述史方法的重要性，除了本身可回溯至大屠殺研究中關鍵的研究方法，對口述的注重也標誌了史學方法從關注偉人、英雄、精英及歷史事件轉向公共史、社會史、日常生活史轉變，在這樣的轉變下，原本被斷代所掩蓋的延續性才能得到更細緻的理解。「空知民眾史講座」即是一個民間自發的、基於口述及實地踏查進行的民眾史運動，不僅使得政府方想隱藏、淡化的強制勞動歷史得以在跨國的合作下被挖掘，也在不同世代的接力下，讓笹之墓標強制勞動博物館得以成為其他後來世代可以學習這段黑暗歷史的基地。黑暗遺產 (Dark heritage) 或困難遺產 (Difficult heritage) 的保存運動以及立紀念設施的行動也是克難時間重要的實踐，研究日本戰時黑暗遺產的韓程善教授在訪談中提到，這種從草根發起的公民運動包含著參與者各式各樣的動機，彼此之間也會有矛盾，尤其在與政府斡旋時，更會發現地緣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張力。



由民眾推動的遺骨返還運動，攝於笹之墓標強制勞動博物館。

#### (4) 克難概念：

克難概念討論的並不是概念生產的拼貼，而是當原始概念落實到實踐時，因應階級、殖民地處境、性別、種族等因素歷經調整，而這個調整會不斷在論述及實踐之間雙向、滾動式進行。這包含統治者及精英階層的概念工作，將外來的主義在地化成「可用」的理論；也包含了非知識份子的一般大眾，透過行動重新定義自由、平等等基本概念，並且以經驗而非推論來了解這些概念，甚至擴增如何得到該概念的行動方案。前者的情況類似薩伊德（Edward Said）所說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談的是理念及理論「如何在個體、情境、時代中旅行」，並在流通的過程中採取不同形式，不管是有意或無意間受影響、創意性的借用或全面性的挪用<sup>8</sup>。大正時期活躍的思想家吉野作造所提出的「民本主義」，可以視為同時對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的克難，並以接近薩伊德所說的「創意性的借用」來創造出這個概念。韓程善教授在他對日本帝國如何重新詮釋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研究中提到，當時許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相信，透過強化自由主義，可以建立真正的政黨政治，進一步推進他們所理解的民主，並以此為基礎更「理性地」治理帝國。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被視為日本語境下對民主的詮釋，結合民權及天皇，成為一種介於民主與非民主之間的概念。Michael Kim 教授在訪談中提到的「殖民法西斯主義」（colonial fascism）也是類似的情況，這個理論源於 1950 年代開始，有不少思想家在處理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之間的關係，如 Frantz Fanon、Aimé Césaire、Hannah Arendt、

<sup>8</sup> 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26.

Albert Memmi 等，這個視角提供了關鍵論點：法西斯主義其實是先在地出現的，而不是先在殖民國出現的。以日本為例，相對於日本本國經常被描述為「準法西斯體制」，它在韓國、台灣、滿洲的統治其實就是法西斯統治，因為殖民地不需要遵守和本國相同的規則，你可以對殖民地的人做那些不能對日本人做的事，而且許多監控、強制動員等技術，也都是先在地發明出來才被運回殖民國使用。如果以這個視角來分析極權政府如何在本國及殖民地以論述及實踐製造他者，或許我們可以得到更細緻的語言來認識在當今世界上，自由民主與極右派在很多時候描述的是同一群人的情況，而這也是我們為何必須讓對殖民主義的認識繼續旅行到當代，並克難的以此來談冷戰年代的語言不再完全適用的地緣政治。

另一種克難概念在實踐的時候，行動者的腦中並沒有在想什麼概念，他們並沒有在想「我要怎麼挪用自由的論述」，而是先做了之後，以言外之意的狀態理解這個經驗。難民、政治犯及戰俘在生存危機、禁錮及監控的日常中，對於贖回正常生活的各種行動，拓展我對「自由的人」的理解：誰可以自由、什麼情況叫自由、如何獲得自由。尤其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到，對於這些沒有生活餘裕的人們來說，即使各自帶有不同動機，花費體力及手邊有的資源並投注在藝文及娛樂上，也正是一種克難出普通生活的行動。新加坡樟宜監獄在日本佔領時期是惡名昭彰的戰俘營，和我在綠島上看到政治犯們的克難物一樣，當時戰俘留下許多「樟宜製造」(Made in Changi) 的日用品，此外，因為日軍對營內攝影管理很嚴格，但繪畫及文字等其他創作形式則相對寬鬆，因此留下不少由創作捕捉的場景。從《釜山日報》記者雲有京的專欄及訪談中得知，戰火下的釜山儘管生活困難，各類型的藝文活動卻仍然非常蓬勃，在戲劇活動的部分，除了可以看到《哈姆雷特》、《奧賽羅》、《雷雨》等演出，甚至有兒童劇場。左翼戲劇活動家韓亨錫當時在釜山創立「自由兒童劇場」。有鑒於當時有許多孩子在逃難過程中失去父母，成為戰爭孤兒，他想透過兒童劇向這些孩子傳遞鼓勵與希望，讓他們產生「一定要撐下去」的信念。當時會把童話改編成戲劇演出，演出經常座無虛席。這種類型的克難概念沒有辦法以思想史的方式做研究，但能夠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讓我們了解到，如果「人性」是一個概念，我們從來未曾掌握它。



樟宜監獄的囚犯所繪的獄中生活素描。攝於樟宜監獄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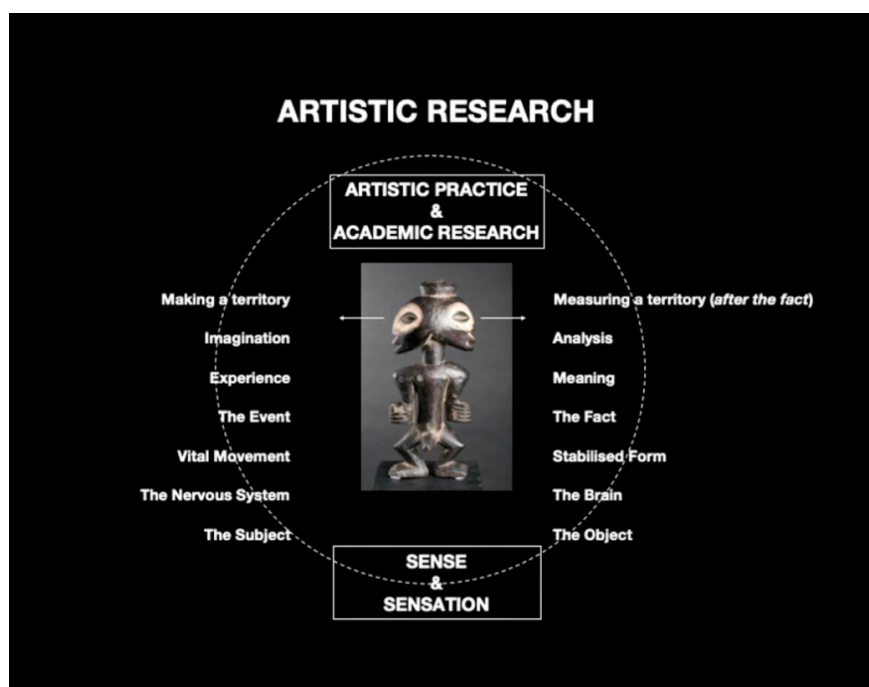
### 3. 作為藝術式研究的「克難研究」

在戰爭或極權統治下，克難的行為之所以會發生，可以整理出以下幾種原因：資源不足與分配失衡經常是導致克難人／物出現的主要因素；邊界重劃以及臨時性的常態化使得不管是統治者或是人民都要克難空間；審查、民主化困境與後記憶的難題使人們必須克難時間；某個概念或理論在在地化的過程中，或是因為個體差異而必須在實踐時挪用，也是必須克難的原因。這次我是以踏訪城市為範疇來收集不同的克難，光是在台灣、韓國、菲律賓、新加坡、日本，就可以發現不同的克難案例連結到很多不同的理論、學術領域及研究方法，包含史學方法（如日常生活史、口述史、公共史、物質文化史）、媒體研究、都市研究、記憶研究、性別研究、後殖民及解殖研究、文化研究、以及關注在日常層次的抵抗研究等。儘管每個案例及相關理論都像是在處理很不同的命題，但似乎可以找到一個共性，研究者們不再把民眾視為消極接收者，開始關注人民的日常面向，並且以真正生活過的經驗來重新認識被斷代史所忽略的現實；同時不再把統治者的治理視為穩定不變的，而是仔細審視統治方式的變動如何受到國際局勢及殖民地情況的影響。

但上述的研究目標會遭遇到很多困難，其中從訪談者身上最常提到的就是檔案匱乏及政治上的考量，本來從底層來了解歷史的角度，歷史資料比起偉人及機構就已經十分有限，戰亂及後續政權的政治迫害又使得證言及物證的取得更困難。在這個基礎上，我試圖提出以「克難研究」作為藝術式研究（artistic research）的一種方向。一方面，從這次訪談中，我感受到在做這類型研究的人

們很積極、開放的想以各種方式呈現研究內容，例如許多學者會擔任影視計畫的顧問，或是會接受我的訪談邀約也是想看看有蛇麼可能性，雲有京記者在《釜山日報》後來有一系列的專欄是委託當代小說家為戰時釜山文化史寫短篇小說，背後的原因有很多種，除了想要與官方的歷史敘事抗衡，讓大眾了解更多戰時情況，觸及的「大眾」當中也很可能包含潛在的口訪對象、私人檔案收藏者、民眾史運動的人們，在多種形式的廣泛合作中，另一種歷史的討論才有機會再度以「我聽說……」的句子重新在人群中被啟動。

另一方面，如果從藝術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克難研究也可以作為一個具體實踐藝術式研究的領域。藝術式研究強調的並不是關於藝術的研究（research about art），而是通過藝術來進行的研究（research through art）。Paulo de Assis 透過區分學術研究及藝術實踐來解釋藝術式研究，分析二者在方法、生產結果、形式、主體等的差異，並且強調正是處在這二者之間（in-betweenness）才是藝術式研究最有生產力的地方：在「之間」的位置，藝術式研究如同擁有兩張臉的雅努斯，同時面對生產意義（make sense）及生產感知（make sensation）的雙重任務。



出自 Paulo de Assis 以 On Artistic Research 為題的演講簡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I2C8120Qs>

換言之，藝術式研究所描述的並不只是某個藝術家在做創作時針對某主題進行研究，而是一個有意識的在實踐及理論之間工作，並依此調整形式、感知經驗、倫理問題、公眾關係的位置。而且藝術式研究也有更多形式處理歷史中沒有實現過的未來，這是在後殖民及解殖研究中越來越被重視的主題，這種未

來基於實踐者對於「常識」及「想像」的計算，而常識又是來自人們對過去及現在發生的事情的分析，因此，未能實現的未來成為一個時光機器，讓後人可以疊合起不同時態來認識某個歷史現實。各種類型的克難標的也都關於不同時態，被克難出來的東西像是遊戲過程中的儲存點，這是上一關及下一關同時存在的時刻，但下一關並不代表就是全然未知的世界，只是還無法被自己掌握全貌的秩序，就像是玩家在每一次退回儲存點之前，都一定更新了自己對無法攻克의下一關有限知識及經驗，而也是在這個節點上，人的可能性及特定歷史發展的不可能性也都被儲存於此。